

# 日共與俄共的東京會談

張棟材

俄共於本年一月末派遣了一個以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蘇斯洛夫爲首的代表團抵達日本東京，與日共方面以書記長宮本顯治爲首的代表團舉行會談，事後曾發表共同聲明強調「兩黨關係正常化」。這是自一九六四年春日共派遣幹部會委員袴田里見率代表團赴俄與俄共舉行莫斯科會談決裂而使雙方關係陷於斷絕狀態後的一次「解冻」，它予世人的印象是：擁有俄共、共匪這兩個母體的日共，在俄、匪交惡中一度就匪反俄，如今又回過頭來再就俄反匪了。

## 一 日共跟進反俄戰列的經過

日共係在俄共、共匪兩個母體養育下，由出生到成長。在最初俄匪勾結一致的期間，它大有左右逢源均可壯大自己之概。但這種好景爲時不常，俄、匪間日益加深的矛盾演爲公開衝突後，它却只淪爲被兩面奪取的工具，俄、匪都不容許它站在中立地位，逼着它必須表明二者擇一的態度。日共在決定追隨共匪共同反俄時，曾有過一段拖延、徘徊、猶豫的痛苦過程，它是在一步一步地逐漸跟進而加入共匪反俄之戰列的。我們可以從下列資料找尋它徐徐邁步的足痕：

一、一九六二年一月，日共利用中委會主辦之雜誌「世界政治資料」編出了「阿爾巴尼亞問題」特輯，將俄共指責阿共之論文與阿共指責俄共之論文同時介紹。表面上似不偏向任何一方，實質上則已響應了共匪，間接地藉阿共對俄共的批判顯示出對俄共的敵意。

二、一九六二年，歷經俄共對阿共斷交、古巴問題、匪、印邊境戰爭等事件，俄匪對立更趨尖銳化，在在均迫日共表示立場。結果，日共終於以號稱「獨自之見解」，聲明承認阿爾巴尼亞爲社會主義國家；反對在古巴問題上與美妥協；有關匪印邊境糾紛則全面支持共匪。

三、一九六三年二月，日共中委會召開全會，通過呼籲全世界共黨團結之決議，對俄、匪的評價，着重於頌揚共匪。如對俄共僅作禮儀的讚辭，稱之爲「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被公認爲已達成先驅者之任務」，而對共匪便譽之爲「其援助亞、非、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鬥爭、世界和平、民族獨立、人

民解放之功績，無人敢於忽視。」同時並論及日共與共匪之關係稱：「在過去有共同流血，向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戰鬥的傳統，現在又在爲反美帝而共同鬥爭」。且含有向俄共示威的語句稱：「日共和中共、北朝共、北越共、印尼共及其他亞洲共黨具有不可分離的聯帶關係。」

四、上項決議發表後，等於是日共正式宣佈了它要親匪疏俄的方針。俄共即於二月二十三日以祕密函件致日共，要求日共派大員至俄舉行會商，日共於此時採取拖延手法，拒不赴會，仍圖避免與俄公開決裂。

五、一九六三年七月初，共匪與俄共舉行會談，日共尙甚感興奮地期待能有良好成果，這是有二重母體之日共的內心真情。但在此一會談的同時，俄亦與美、英商談局部禁試條約，俄、匪會談終於該月二十日不歡而散。這局部禁試條約成立後，日共常委會聲明及「赤旗報」論調認此舉將使反美帝國爭失去應有之警惕，已明示其傾向於共匪見解。

六、緊接着於該年八月在日本召開之第九次「禁止原、氫彈世界大會」中，俄、匪兩方代表大起論戰，日共拒絕支持俄共代表團提出贊成禁試條約的要求。十月間，日共中委會全會再通過決議，堅持反對禁試條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召開無共匪在內之國際共黨會議，已抱有不惜對俄共責難的決心。

七、一九六四年二月下旬，日共派遣袴田里見率代表團赴俄與俄共會談。這是一次攤牌式的會談，日共向俄共提出了有十幾條的抗議文，當時俄共方面出席此一會談的是政治局委員布里茲涅夫、蘇斯洛夫等人，曾指日共抗議文爲「最後通牒」，黑魯曉夫在宴會上當面譏罵並威嚇日共代表團稱：「

你們走錯了地方，這裏不是北平，乃是莫斯科」。袴田里見等即於三月十三日深夜飛往北平，會合了在那裏待機的宮本顯治與共匪舉行正式會談，宣稱共同一致反美、反現代修正主義鬥爭。從此，日共便與俄共分道揚鑣，一意地依附了共匪。

八、同年五月，日共內親俄派首領志賀義雄以日共籍衆議院議員身份在日衆院對禁試條約投了贊成票，日共將其立即除名，且將其他親俄派份子皆以「反黨」理由一一逐出黨外。俄共於此時亦對該批親俄派份子公然予以支援，其後遂出現由志賀義雄等所另組之「日本共產黨（日本之聲）」，以圖取代原有之日共。

九、同年七月十一日，俄共致函日共責其對俄共所發出之函件既不交黨內討論，亦不答覆，係屬「有意與俄共及國際共產主義悍然斷絕關係之行為」，俄共稱：「爲將此等問題訴之於所有日共黨員起見，將公佈函件內容。」旋俄共即於十八日將指責日共之「四月十八日函」「七月十一日函」同時一併公佈。日共爲對抗俄共此舉，亦公佈其於七月十五日致俄共函件，指俄共應負導致國際共黨分裂之責任，並抗議其對日共內部之不當干涉。至是，雙方乃展開互相攻擊之「函件戰」。

十、同年十月，俄共中委會突將黑魯曉夫解職，在俄共發表的當天，日共書記長宮本顯治向日本新聞記者發表談話稱：「這是現代修正主義路線失敗的結局，足以證明中共和日共的路線正確。」幹部會委員袴田里見亦於同日在日共總部作秘密演說揭露俄共利用俄駐日大使館爲基地以大量資金買收日共份子從事分化工作之內幕，特作警告稱：「現雖由黑魯曉夫改換爲布里茲涅夫，仍不容驟表樂觀，須繼續致力反國際的修正主義。」其後，「赤旗報」所刊出的論文，均同於共匪「人民日報」之反俄共論調，稱俄共新領導人在執行「沒有黑魯曉夫的黑魯曉夫主義」。

十一、一九六五年三月一至五日，俄共召集的國際共黨籌備會議臨時時又改爲「共黨工黨代表協議會商」，日共在很早以前便堅決表示拒絕參加，此際於四月十三日之「赤旗報」發表了「關於俄共領導人於三月一日在莫斯科召集的會議」一文，稱此一會議爲「分派主義的，分裂主義的性格」，不承認其爲正規的共黨代表會議。

日共與俄共的關係發展到此一地步，已很明顯地由「同志」變成爲「仇

敵」一樣地惡化了。不過，日共之所以致此，亦很明顯地露出它所受到共匪的影響。換句話說：它是爲追隨共匪而反俄共。我們可以把這一段期間日共在「赤旗報」上刊出的反俄共論文和共匪的「人民日報」「紅旗」論文對照一下看看，差不多都是在共匪表明了態度之後若干時日，日共才表示出同於共匪的主張與見解，甚至所用文句、語氣和結構也都是模一樣樣的。

## 二 毛匪打散了日共的親匪關係

日共既已完全站在共匪的一邊來反俄共，何以又有了今天的急轉彎，突然回過頭來以通過與俄共舉行東京會談的形式作出重新調整對俄共關係的姿態呢？根據日共書記長宮本顯治、幹部會委員岡正芳等在這一年多來的對外有意的透露，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是毛匪澤東壓迫日共所造成的一個結局。

一九六六年二月初，由宮本、岡正芳等七人組成的日共代表團訪匪，並順道訪問北越、北韓，歷時達兩月。那次日共與共匪的兩黨會談，如對於反美、反現代修正主義、警戒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以及主張爲支援北越致力廣汎的國際統一戰線等項原均亦已雙方同意並擬就共同聲明，且由匪方舉辦了慶祝酒會，但最後却爲毛匪澤東一手否決。毛匪在當時竭力強調美、匪戰爭必至論，迫使日共再度採取「五一年綱領」，而宮本則表示難以接受，就這樣便使日共與共匪間的親密關係爲之突變了的。

所謂「五一年綱領」，乃是日共的已故首領德田球一及現任日共主席野坂參三於一九五〇年六月因受盟總整肅潛入地下活動後被共匪接至北平，兩人在避居北平期間就日本革命的戰略戰術和共匪首領們檢討協議，大部份容納了毛匪意見而定稿的。此一綱領是代表日共從「和平民主革命」突轉爲「武裝暴力革命」的一個重要標誌，當時韓戰因共匪之參戰正在激烈進行，日共提出迎合共匪、俄共意旨的在後方擾亂美軍的計劃，自然是最符合共匪與俄共的要求。日共於一九五一年十月間照此一綱領決定下的武裝準備行動，是以發展大眾的游擊戰爲主，有關成立以工農份子爲中心的「中核自衛隊」組織方法、游擊戰術，特別是建立山岳地帶根據地的行動、奪取武器與使用方法、製造簡單武器方法、軍事訓練要訣，誘導農民技巧……等，一切均係抄襲共匪的經驗，其所發佈的若干文件，如「中核自衛隊之組織與戰術」

，在內容上皆同於毛匪所著「論游擊戰」一書。對於此點，俄共於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致日共公開信中曾作了這樣的一段揭露：「一九五一年綱領雖是經過史達林修改過的，但那只是史達林個人的意思，蘇聯共產黨則毫不知情。不僅此也，在一九五一年綱領之外，日共還制定了軍事方針，蘇聯絕沒有一人參與此事。我們不知那究竟是在那裏決定了的，但顯然是教條主義式地模倣了中國共產黨的經驗（如在山岳地帶展開游擊戰並建立據點等事），蘇共對此舉實深感不妥。」從俄共的強辯中，可知此一綱領是德田、野坂執筆而經史達林、毛匪審訂的集體創作。

這一個集體創作曾使日共招致最大的失敗，且至今猶存創傷，餘痛在身。而毛匪却於此際忽又舊案重提並迫使日共代表宮本接受，應知這是強人之難，不合情理。可是，毛匪却聲色俱厲地堅持非如此不可，全失去以往對日共的懷柔禮遇，其用意則是頗為深遠而陰狠的：

第一：毛匪已開始動念利用其試爆成功的優勢要積極推行他的「中間地帶論」理論，先在亞洲燃起他認為可以煽惑的「革命烈火」。毛匪的想法是：美國在越南雖已出動數十萬大軍亦未能取勝，且已陷於被困之泥沼。如在此時能再在韓、日、菲、緬、泰、馬來亞、印尼等地由當地共黨發動人民武裝鬥爭展開游擊戰，則美國縱派百萬大軍亦無能為力，其國內更必因是怨聲載道，激起反戰運動之混亂。因之，毛匪在自居為亞洲共黨領導人的狂想下已擬定下上述「人民武裝鬥爭」、「游擊戰」的整個程序計劃，故迫使日共重新執行「五一年綱領」配合響應。

第二：毛匪製造紅衛兵造反型的一種奪權方式，已早施之於日共內部。歷年來經過共匪訓練的日共青年幹部，如最著者自一九五九年起即有大批日共份子由共匪之「馬列學院」畢業搭乘日船「白山丸」返日，曾在日本社會轟動一時的所謂「白山丸事件」，即其一證。該批青年黨員多為日共地方黨部之中堅，毛匪素將其作為聽命於北平指揮的羣衆看待而大力培養，在毛匪以強硬態度施於宮本時，已有了培養日共青年幹部為紅衛兵用以成為「奪權派」的腹稿。

在毛匪的企圖為日共發覺後，日共才張皇地利住了親匪的「一面倒」，於一九六六年十月召開第十次大會中唱出要走「獨立自主」路線的口號。這一次大會是日共對共匪關係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個分界嶺。不過，毛匪雖一手打

散了日共的親匪關係，却亦同時建起另一支親匪的「日共」組織：當年負責執行「五一年綱領」，被日共開除了的原中央常委志田重男，已經出面聲稱組成了「日本共產黨（解放戰線）」；山口縣、愛知縣、千葉縣等地方黨部則均相繼冠以「左派」字樣，聲明脫離「代木」所在地的日共而自稱為日共的正統，他們都表示擁護毛匪，要向「宮本修正主義集團」鬥爭。共匪人民日報（見一九六七、十一、十七）曾稱：「宮本集團的壽命是長不了的，現在日共左派大造其反，這是日本大地上的曙光。」對宮本所加上的罪狀是：「把他拿到毛澤東思想的照妖鏡下一照，原來是一個貨真價實的資本主義看護婦，蘇聯修正主義的應聲蟲，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可恥叛徒」。

宮本領導體制下的日共，在面臨外受毛匪擴業內受奪權權造反的生死關頭，只有斷然地採用了兩項應急措置：其一是將黨內自中央以至地方的親共份子一大加剪除；其二是掉回頭來再向原來的另一母體俄共投靠。這次的東京會談，乃是在宮本完成其第一措置深獲俄共之心後而得以實現了的。

### 三 東京會談的前後

日共之重新投靠俄共，首先要衝過一道障礙物，那就是如何使俄共取消對親俄派份子志賀義雄等另組日共的支援。這是日共、俄共間談和的第一個先決條件。

按按日共先後開除而各立門戶的親俄派計有志賀義雄等之「日本共產黨（日本之聲）」；內藤知周等之「社會主義革新運動本部」；春日庄次郎等之「統一社會主義同盟」，在俄共原定計劃中本是要這批人合組一新日共以謀推翻反俄共之日共的，事實上這批人也躍躍欲試地於一九六六年三月遵從了俄共指示成立有「組織統一準備委員會」，並預定於同年十一月舉行組織大會。可是到了大會前夕，俄共因見日共與共匪反目之象已甚顯著而臨時變了卦，則又指示這批親俄派份子中止組織了。現在證明俄共的此着已為日後與日共和解會談鋪下了路，將最大的障礙物暫時推到一旁。

我們判斷在日共與俄共舉行東京會談之前，雙方定會有過暗盤的交易進行。俄共雖以不支援親俄派份子另組新黨一事向日共讓步，但它也必然換回等值的日共承諾，其最主要的當為要求日共須對毛匪及其「文化大革命」照

俄共方式予以抨擊，作為重新投靠俄共的憑證。關乎此點，可舉下列事實作為依據，如：

一、去年（一九六七）十月九日，日共發表了一篇以「今日之毛澤東路線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為題的長篇論文，（見十日之「赤旗報」）對所謂「毛澤東路線」「文化大革命」作全面批判，指其「與馬列主義毫無因緣」，且責毛林派為「把中國共產黨當作私產，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叛徒。」這與俄共的論點整個雷同。

二、日共繼即於十三日之「赤旗報」公佈了俄共電告日共謂將派遣代表團至日與日共會談（十月五日），以及日共答覆同意（十月十二日）的電文。從電文時日上看，日共之發表那篇正式宣告反毛匪的論文，恰是在接到俄共答應派代表團至日的確證後，才敢於發表的。當時尚曾預測稱此項會談將於十一月間在東京舉行。

至於東京會談何以較預定延期兩月後始克舉行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在處理志賀義雄等親俄派份子問題上，雙方仍未能事前達成協議之故。在那次發表將舉行和談消息之十三日「赤旗報」內，亦曾刊出日共幹部會委員西澤富夫的談話，牽涉到志賀等問題。西澤稱：「俄共領導部已表明了和志賀等一派反黨份子毫無關係的意向。」據傳俄共阻止志賀等另組新黨的代價，是要日共許可這批親俄派份子復黨，而日共對此尚不願考慮，這是一個橫在雙方中間的難以短期解決的爭執。

此次日共、俄共的東京會談計自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一共舉行了五次正式會談。俄共代表團團長為俄共中素以理論家聞名之中委、政治局委員蘇斯洛夫，在俄共領導者內是位居第四位的要員。團員中的波多馬列夫，為俄共中委書記，主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費多西夫，為俄共中委兼任馬列研究院院長。烏里安諾夫斯基，為俄共中委兼任遠東部次長。柯維倫柯，為俄共中委會書記局一向擔任對日工作的專家。這一代表團陣容的特徵是着重於理論人選，說明俄共對一度追隨共匪反俄共，現又重回俄共懷抱的日共，具有將予以理論的說服與再教育作用。日共方面的代表團係由書記長宮本顯治任團長，他是當前握有日共領導權的領袖。團員袴田里見，為幹部會委員，是僅次於宮本的黨內實力者。西澤富夫，亦為幹部會委員，精通數國語文與國際知識，是日共「獨立自主」政策的設計人。下司順吉，為幹部會候補委員，任統一戰線部長，向以事務與組織力見長。上田耕一郎，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任第一政策委員會委員長。日共排出這一個代表團陣容，其特徵

是由宮本率其身邊心腹親自出面以示鄭重其事，表明對俄共投靠的真誠負責態度。

俄共在此一會談中對日共施行理論的說服與再教育的例證，可由宮本於會談結束後在記者招待會中發表的談話尋出。宮本曾稱：雙方在會談中就毛匪「文化大革命」問題交換過意見，他發現到雙方的觀點極為近似。實際上，這只是宮本一種故弄虛玄的說法，日共在去年十月九日之前一直未對毛匪與「文化大革命」表示過意見，而俄共却一再對毛匪加以攻擊，宮本所稱的「觀點極為近似」，就是變相地承認接受了俄共的觀點。

還有關於作為日共與俄共間和解障礙的如何處理親俄派份子問題，在此次會談中也似已討論獲致初步結論，那就是正如志賀義雄對每日新聞記者所說的，將來終必以復黨求得解決。此一問題在當前尚需要一段冷卻期間，等待日共與俄共恢復友好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上述兩事均未列入日共與俄共的共同聲明，但這却是東京會談中的真正議題。至於共同聲明中所稱：雙方共同致力於團結反帝國主義勢力，支援越南人民，以及雙方同意在嚴格遵守一九六〇年共黨會議所揭示的自主、平等、互不干涉內部問題的原則下竭謀兩黨關係正常化……等協議事項，實則為僅對上述兩事的一些故作堂皇的點綴。

宮本在東京會談後亦曾對記者宣佈日共決定不參加二月廿六日在布達佩斯舉行的「世界共黨大會籌備協議會」。日本的評論家多指此點是俄共代表團在東京會談的最大失敗。但這只是皮相的看法，應知俄共已使日共按照俄共所要求的方式指毛匪之名及對「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攻擊，就已取得較任何為高的效果，日共是否出席布達佩斯之會和這個比起來，則屬次要之次要了。蓋布達佩斯的會議早由俄共透過匈共在邀請時便已保證不對共匪公開譴責或排除於共產集團之外的呢。

共匪對於此點感受得最銳敏，所以在日、俄共的東京會談後（二月十二日），它曾評稱：「蘇聯修正主義和宮本集團此次會談的主要內容，並未列於共同聲明之中，那就是曾經密商過如何加強聯合反對中國的問題。這一會談的結果，必然是蘇聯修正主義在其反中國陰謀上更要曠使宮本集團為其服務。」宮本在會談後記者會中對有關共匪的談話，可以說是最使俄共代表團此行感到滿意的一點了。總之，照這次日、俄共「解凍」的東京會談經過看來，主要地在對共匪問題上達成了協議，日共已充分地扮演了就俄反匪的角色。此際應注意的是：日共之反匪只是反「毛林派」之匪，有其限度性。同時它之就俄，也因此而有同樣的限度性。（民五七年二月二十日）